

海外治中国学问

(澳大利亚) 柳存仁

研究传统的中国学问，就是在中国本土，由有经验的中国学者们努力爬罗剔抉，就前人的业绩上去芜存菁，希望能够在一个人可以预计的时期内、在某一方面做出一点成绩来，原就也非易易；何况僻居海外，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图书度藏，既不敢说是完备，师友切磋，往往也只限于少数常见面的人，比起《庄子》说的“旧国旧都，望之畅然”，那真是相去很远的了。我工作差不多有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那么长时间的学院，大学里叫做Faculty of Asian Studies者，说中文我平常总是管它叫亚洲学院。近年也有人把它翻译做亚洲研究院的，字面上说，倒也不错。我也不好改正它，因为Study这个字，虽指学习，也还有深入调查研究的意义。可是，我这个食古不化的头脑，听了这个名称，就常会想起《三国志》里骆统上表给孙权替张温辩白说的：“若潜神留思，纤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这几句话来。我想说研究真地谈何容易！潜神留思，纤粗研核，做得到么？

中国有记录的历史的年代，本来就比许多别的国家、民族的来得长；这还不包括考古和史前史的知识在内呢。单只就古籍两个字的范围内说，从《五经》开始直到清代人的各种著述，细大不捐地都包罗在内，那简直汗牛马、充栋宇都不足以形容它的繁

博。文字的体制当然十成里有九成以上全是文言的，这文言有的是比较平易容易看的散文，虽然其中也不免夹杂着一些从前的读书人认为应该是常识的所谓典故（那超出常识以外的算是僻典）；但是散文之外，还有骈俪的文字，它们不止在文学史上，曾经开创过一个很长的时期的灿烂局面，就是在实用文字方面，象传记、诏书、奏章、公牍，甚至茶余酒后的游戏文章，也要占很重要的席位。我们都是现代人，现代社会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和冲击远非十九世纪或本世纪初期以前的人所能梦及。时代的差距那么远，相形之下，我们对于这些古典著作的理解、体会，恐怕不但不似两三千年来生存在那样的文化环境里的古人那样自然，就是和六七十年前的人们相比较，也难免有望尘莫及的地方。话虽如此，现代的学者们也有他们的幸运之处。随着时代的进步，研究中国过去的历史、文物，在近几十年来似乎已经成为世界上的显学了。中国语文在世界各地普遍地有人学习，有些国家的大城市甚至在中小学都已经开班尝试。从语言进一步到文学、历史、哲学思想、社会、经济……每年都有不少崭新的出版物。量的方面固然可观，质的方面有些著作也有着实比一百几十年前的西方汉学大有进境。资料的交换，研究方法的观摩沟通，当然也会给中国的青年学者们一些刺激。

中国的古籍既然那么多，性质那么驳杂，研究起来最好一方面要明了它们的分类，一方面也先得知道一下它们的总值或全貌。简括地说，这种基本的知识就是所谓目录之学。目录学这个名称，似乎也有广狭两义。广义的目录学，其实也可以叫做目录学史，它的范围可以从汉代的《七略》、《别录》的流变讲起，主要在说明历史图书的沿革性质，研究的重点是重于今的。狭义的目录学，比较地更实用一些，就是研究需要时我们今天所能够接触到的现存的古籍的分类目录。这种目录当然伸缩性是很大的。大的图书馆收藏丰富，藏书家私人的书目也很可观，小的象

过去各地旧书肆盛时，每一家书铺自己刻印送给顾客的书目（上面还有定价和一些关于板本的零碎说明），也能够增加一般学者们对古籍的认识。从前胡适之先生（适）常对人说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的几家旧书店的学徒和小伙计他们对旧书所有的知识，就远胜过一个刚从国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他这话并非全没有道理，但是书铺的学徒假如完全不读书，他所有的知识只是一种机械性的检索的知识罢了，仍旧不能真正应用到对书籍内容的理解上面。我们研治古代的学问，运用古籍的人，基本入手处是想知道：（一）究竟有些什么古书，它们的性质是怎样的；（二）这些古书传统的方法向来是怎样把它们分类的；和（三）这些类别为什么要这样分，它们相互之间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有的是什么一种关系？要想满足我们这几个要求，《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依然是一部可以供我们利用的敲门砖。

《四库全书》是清朝帝王统治时代完成的一部只有少量手抄本的大丛书，庋藏它的文渊阁、文澜阁……本身就是专门储藏它的图书馆。它虽然未必能够包含当时所有的古书的全部（大家知道收在里面的还有删削窜改的情况），但是它的分类的确可以说是传统的古书分类最后一张细目，说不定也可以说是一张考虑得很周详的细目，这在从前的人说是无疑的。当然，古书分类的问题十分复杂，《四库提要》本身自然也有许多照顾不到或安排失当的地方，等于现代人假如想把一个巨大的工作单位的建制或工作系统列出一个各如其分却又别无遗漏的纲目时，也常常会有踌躇、斟酌或事后不满意的那种情形一样。不过就大体说，我们要熟悉从远古直到清初古书的性质，更从它们的分类细节去体会、摸索、寻检其他的并不一定包括在《四库》里面的书籍，《四库提要》无论如何是不能够不细读的。汉代著录书籍本分七部，西晋以后开始分甲、乙……等四部的，但是当时的乙部是诸子，丙部才是《史记》这些书，和后来通行的经、史、子、集的分类

还不相应。经、史、子、集是唐初的分法，《隋书》是唐初编纂的，它的《经籍志》已开始这样做，《四库》的次序就是承袭着这个传统而来的。现在我们姑且拿《四库提要》的史部做个例子，看看那里面究竟包括些什么。《提要》的卷四十五到四十六是正史类，卷四十七到四十八是编年类，卷四十九是纪事本末类，卷五十是别史类（收的象《东观汉记》、《建康实录》这些书），卷五十一到五十四是杂史类（收的象《国语》、《战国策》、《贞观政要》这些书），卷五十五到五十六是诏令、奏议类，卷五十七到六十四是传记类，卷六十五是史抄类（例如南宋吕祖谦编的《十七史详节》），卷六十六是载记类（指叙述帝王时期一些割据争霸的政权的史籍），卷六十七是时令类（古代农业社会民间的行事需要运用历法天文的知识，这种知识由政府颁布，故曰时令），卷六十八到七十八是地理类，卷七十九到八十是职官类，卷八十一到八十四是政书类（指制度、法令、典礼这些），卷八十五到八十七是目录类（分经籍和金石两类，后者包括考古、法帖这些），最后卷八十八到九十是史评类。其中某类卷帙比较繁重的，内容也就很杂。譬如地理，它又细分做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游记、杂记、外纪这些子目，外纪指的是属地或外国。我这里只举史部的分类，其他经、子、集三个部门，当然也有它们的子目，分类也很繁细；这把《提要》卷首的目录翻看一下就知道了。不过重要的还不在需要太详细地记得它的目录（这慢慢地多翻几十遍总会熟悉的），要紧的是要知道那些记录在《提要》里面的许多书的内容。《提要》之比其他的书目更有用，就在它能够教我们未读一部书之前先大略知道一下这部书讲的是些什么；读了它，再读它前后有关的别的书的提要，我们就大体能知道某一类的书籍的性质了。这些一篇篇的长短不齐的提要，也不一定篇篇全是写得十分确当的，但是它也大概不会比近些学者们写的什么书目解题之类的入门书更弱，而《提要》所包含的

书籍之广博，却远在许多近人的著述之上。现代的史家余季豫先生（嘉锡）有《〈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是读《提要》的人同时必备的参考书。余先生的考证，是很精审的，他的大著里虽然仅叙及大约五百种书的样子，这恐怕已经很够读者们取样的了。余先生每批评一篇《提要》，必定先引原文一段，然后在引文后面低一格逐段写他自己的长短按语。这也是很方便读者对照的。在几十年前，已是民国时代了，《四库》的本子还是不曾流通，有些罕见的或平常读书人未必有力购置的书，或居住在大图书馆不多的地方，参考就很困难。近年影印的技术更进步，应用更广，《四库珍本》之外，《四库全书》本身也影印出来了，我们读了《四库提要》要检原书，就比前人方便得多。有了《提要》和余先生撰的辨证，基本地熟悉《四库》的内容，我们运用古籍的能力就比较地有些把握了！

我们读了余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就知道《提要》固然给我们许多方便，它们也有不少个别的缺失。其实，不但《提要》的内容，就是《四库》的分类子目，象我在前面所约略提过的，也何尝没有令我们困惑的地方。如果不熟谙《提要》全书的组织，只是在需要时轻略地索检，劳而无功的、绕着弯子白走了一大截路的情况，是我们初学的人常常会遇到的，也常常会令我们感到困蹶、挫折，甚至望洋兴叹。这不一定是我们的古人没有分析的一方面，而是历史、文化和环境造成的一种文物观念的凝聚性，就象有些民族的语言构造能把许多观念综合在一个词里，或者一个词就等于是一句话那样（虽然汉语的结构却不是这样）。中国在秦汉以前许多古书基本地就是一部散篇的总集，象《墨子》，既有《尚贤》、《尚同》、《兼爱》……那些讲政治思想的篇章，又有《备城门》、《备高临》这些讲守城的篇章，而《墨经》更似乎是从形式逻辑到物理无所不包的著作。象《吕氏春秋》和后来的《淮南子》这些“兼儒、墨，合名、法”、古

人本来就把它归在杂家类的书籍，更不用说了。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现在保存的是一部散佚不完、文字颇多讹谬的古籍了，它的本旨我们总该承认是一部阐扬《春秋》公羊一派学说的重要著作。但是它又杂阴阳五行，在它的《循天之道》篇里，居然还谈到男女应该在什么生理条件下才交接，多少日子才“游于房”这类性卫生的话。有了这样的对书籍和篇章的观念，象《四库》那样的分类，恐怕已经要算是尽可能的能够实用的分列办法了。论典章制度的书，大家都听说过《三通》乃至《九通》、《十通》这一套。《通典》和《文献通考》，《四库》都收在史部政书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在《提要》的政书类里，却找不到《三通》里剩下的另一部郑樵《通志》。原来《通志》是收在别史类的，因为它除了著名的《二十四史》之外，还有一部通史性质的帝王本纪、后妃传、年谱、世家、列传、载记等一百四十八卷的文字，所以就入于彼而不入于此了。这一类分门别类细细斟酌的情况，是非读《提要》的文字，不能够贯通的，虽然这里所说的贯通，我指的并不是真的学问淹博，只是在迷宫里的一条错综曲折的路径上多走过几次，熟能生巧，不致于每一回都碰壁罢了。一百几十年前的西方的汉学家，从 Abel Remusat (1788—1832) 到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没有一个人不劝人注重《四库提要》的，Wylie 的那部著名的《中国文学札记》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1867*)，实际上就是《提要》的英文版简编，不过包括的书名不象原著那么多，改写的提要也没有原著那么丰赡罢了。我曾尝试把 Wylie 的书里所刊的分类和原著对照一下，许多项目都翻译得不错，有的象地理类，他译做 Geography and Topography (地理和地志)、时令类他译做 Chronography，后者虽然不十分恰当，也可算颇具匠心。书里有许多类，还添进了一些在十九世纪中叶看得到的其他书籍。《四库》的子部杂家类存目本来录有利玛窦 (matt-

eo Ricci)、庞迪我(Didacus de Pantoja)、艾儒略(Julius Aleni)、毕方济(Franciscus Sambiasi)的著述,这里就添了几十种,多是十七、十八世纪时的宗教读物。地理类里又有汪文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这书原名是《红毛番噶咭利考略》,才一卷,汪文泰辑,收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蕴香编的《域外丛书》里。Wylie记这书是1841年出版的,如果不是他错误,也许这书先有单刻本也说不定。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仅在《噶咭利考略》之后两三年,Wylie的书里批评他态度“夸大”,却比较推崇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这些都是当时的时务书了。在天文算法类里,Wylie还特别推崇过李锐(1765——1814)的著作,说他“可能是本世纪里最超越的数学家”,虽然书中很疏忽,竟忘记写下李锐的汉文名字。李锐著名的《李氏遗书》,是道光三年(1823)阮元刻的,我们不要忘记Wylie自己也是科学知识很丰富的人,他曾跟另外一位清末的数学家李善兰一同翻译出版过《续几何原本》、《谈天》、《代微积拾级》等书。

我现在再举一个小例子,说明看《四库提要》对一些看似无关的研究方向的用处。近年颇有不少人在进行研究《金瓶梅词话》,也有人研究《西游记》小说的一个清初的板本——《西游证道书》。这《西游证道书》,系子书先生(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五里记载日本内阁文库藏的原刻本,题“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钟山半非居士黄笑苍印正”。《四库》里面既然不收章回体白话小说(卷一百四十到一百四十四称为小说类的录的全是些杂史性质的书目),看来在《四库提要》里不会找到有关汪、黄的线索了。然而事实却不全是这样。《四库提要》卷一九四、总集存目四就收有徐士俊、汪淇同编的《尺牍新语》二十四卷,《提要》说“士俊字野君,淇字瞻漪,并钱塘人。是编刻于康熙癸卯,采明末国初各家尺牍”。这里的瞻漪是

澹漪的误刻，癸卯是康熙二年（1663）。《分类尺牍新语》还有《二编》和《广编》，分别刻于康熙六年和七年，是汪淇、徐士俊和黄周星（笑苍）三个人合作的出版物。黄周星的著述很多，《夏为堂集》之外，《昭代丛书》、《檀几丛书》里就收了不少，这两个丛书里也收徐士俊的其他著作；士俊著的杂剧、传奇，又收在《盛明杂剧》和《曲波传奇二种》里。近年美国的Ellen Widmer教授研究《西游证道书》，就利用这三编的《尺牍新语》的材料，证明他们刻的《证道书》是在康熙癸卯间出现的。这部《尺牍新语》虽然收录在《提要》的总集存目里，但是流传甚希，因为它还是清初的禁书，见《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

研究《金瓶梅词话》，尤其是考证它的作者，近年在各地是很热门的了。明代屠本峻的《山林经济籍》卷八《燕史固书》里记载他所见的《金瓶梅》的抄本，说：“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往予过金坛，王太史字泰出此，云以重赏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徵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王凤洲大家知道是王世贞，这位曾经被怀疑、后来又被否定是《金瓶梅》的作者的大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王百谷就是王穉登，《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有传，他是嘉、隆、万历间苏州的布衣名士，也是比较知名的。

（穉登是诗人，《明史》说他“刻《燕市》、《客越》二集”，《四库》仅艺术类和小说类存目里提到他关于品画和里社祀神的书，他的《王百谷集》就被打落《全毁书目》里面了。幸而万历刻本的《王穉登全集》是个漏网之鱼，现在还保存。王宇泰的名字较生，若说他就是嘉靖到万历间的大医生王肯堂，听说过他的人就很多了。肯堂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后来也做到福建布政司、参政这些大官，但是他更重要的是他对医学方面的贡献。他的《证治准绳》一百二十卷在中国医学史上是一部有医科全书规模的大书，《四库提要》卷一〇四里也曾加著录。《提要》

卷一〇五医家类存目收有清初武之望撰的《济阴纲目》，是完全因袭《证治准绳》里女科那一部分的，这书且有汪淇作的笺释。原来汪淇他们刻书的范围很广，小说、医书大概都是他们印行的能够深入社会广大读者群的著作。汪淇撰的《慈幼纲目》、《保生碎事》这些医书，也用了不少王肯堂的材料。王肯堂在他的时代是一位很开通的人。他相信儒家和佛教的见解可以沟通，甚至说“教习、庶吉士当令看《楞严经》”，他也曾和利马窦、庞迪我这些西洋教士交游。《山林经济籍》说他用重资购抄本《金瓶梅》，自然也不奇怪了。近来学者象刘辉先生研究《金瓶梅》已注意到王肯堂的《郁冈斋笔麈》（见刘著《北图馆藏〈山林经济籍〉与〈金瓶梅〉》，刊《文献》一九八五，第二期，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曾加引用。刘先生用的《笔麈》是四卷本，这和陶珽所编的《续说郛》卷十四所收的一卷《笔麈》大不相同了。我们未见过原书的人，最早知道《笔麈》有四卷本，恐怕也得拜《四库提要》卷一二八的记录之赐。

以上我概括地说明《四库提要》对我们研治古典著作的重要性，只是希望我们诚实地使用它做步上初阶的敲门砖，并不是说它毫无缺点，却是说其他的清末学者们认为可以供做入门参考的书，象张之洞（缪荃孙帮忙同撰）的《书目答问》，虽然可以教初学略识四部的门类，可是它对各部书籍的内容，却不曾解说，只是举出精校精注善本这一点对当时的读书人可以说有贡献。

《书目答问》刊行之后几十年，又有范耒研先生（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更在板本方面，多所补充，还加入了些民国以来的影印和好的排印本，极为柳翼谋先生（诒徵）所称道。但是《四库提要》的作用，即使这样也还不曾消失。例如我们说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有衢州本和袁州本两种板本，这就是《书目答问》也已经把它们分刊开来了。但是这书衢州本有二十卷，袁州本四卷，后志二卷，是晁公武名下的；考异一卷，附志一卷，

是赵希弁名下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范先生的《补正》还推荐了光绪十年（1884）长沙思贤讲舍刻的王先谦校本的衢州本，并且说“王氏以袁本校衢本尤善”，不过，衢、袁两本的原委，他也还是不曾说明。可是我们如果一检《四库提要》卷八十五、目录类一的《郡斋读书志》一条，两本的关系和晁公武、赵希弁这些人的背景，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解答了。从使用的文字占的篇幅说，《四库提要》是繁细的，《书目答问》的优点是提纲挈领，简便、清晰。但是对于初学未入门的人来说，把话说得详细一点，即使听的人未必完全记得，他的领悟是比较容易的。正象有些学习汉字的西方人说：繁体字笔画多些的象、鬱、鬱这些字，写起来确是很烦，可是认识了之后，倒是不容易忘记。容易忘记或弄错的，反而是亦、且、乃、于这些笔画很少的字。我想借用这个譬喻说：象《书目答问》这种简易的书，在今天我们看来，恐怕反而是高深的。我们初学的人，不能够不尽多地先储备一些基本的知识。

仔细地说，如大家所周知的，《四库提要》不过是书目的一种罢了。正史里面的《艺文志》、《经籍志》和它们的补编；地方志所常收的《艺文》或一地方的《艺文略》；官方的书目（包括后来为官修《明史》的《艺文志》所利用的《千顷堂书目》）；私家藏书的书目或藏书志，从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到近世莫天一先生（伯骥）的《五十万卷楼藏书初编》；汇集成书的和藏书有关的题识、题跋；以及各种专门性的考证书目的《经义考》，小学（文字学）、金石、宗教（象《道藏》）、辨伪、域外（象《古逸丛书》里收的藤原估世撰《日本国现在书目录》）各方面的书目，林林总总，少说也有三四百种，看了怎不骇人？但是有了《四库提要》做底子，对这些有关的书目，见到了我们就多少能够分别它们的时、地、人和用途，知道怎样把它们放在应该放置的地位。例如近年重印的《宝文堂书目》，《子杂类》

里收有两种《水浒传》的本子：一是著名的嘉靖间郭勋刊本（武定本），另一本题《忠义水浒传》。《四库提要》卷八十七的目录类存目里有这书，也叙述了撰人晁瑛和他的儿子晁东吴的略历，并说他们父子都是嘉靖间进士（辛丑，1541和癸丑，1553）。《提要》所说他们的籍贯、功名和《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的记载完全相合。《提要》也述及这部目录的中卷里分的六目里有《子杂类》，但是并不曾注意到那里面就有《水浒》。《提要》因为时代观念的关系，材料的取舍，记载的偏重，固然不免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它对于我们关心的事物，象这里所见到的，也还常常有这些线索，可以供我们印证、追寻。

我在前文已说过读《提要》的目的是想窥知一下古典著述的大概规模，以便在进行研究某一部门的学问、或少至某一个课题时有些基本的常识可以依靠或摸索。这种经验有了，也还只是捉鱼时用的竹筍，鱼来了，就可以“得鱼而忘筍”。这里说的鱼，就是经、史、子、集这些著述的本身。四部里面，《四库》把医家、天文算法、书画艺术甚至类书也归纳到子部里面，那是古人局限于《汉书·艺文志》所说九流、十家这个大范围的规划里不得已的安插，其实就算是这样，子部的性质刻画分明，还不好说它十分庞杂。集部本身的涵义就是杂的：一部普通集子所收纳的文字象四十卷本的《韩昌黎集》，里面赋、古诗、律诗、散文（原书称做《杂著》）、书启、赠人序、祭文、碑志、表状，还有比较轻松的杂文（例如《毛颖传》、《送穷文》），都收在一起。可是，这种分法只论文体，而这类书籍传统的文体，约而言之，也不过只有那么十几类（象姚鼐《古文辞类纂》所说的十三类）。我们读历代诗文集的人所怕的只是它们的数量太多，浩瀚难尽，还不太担心于不理解它们的性质。就我的浅识观察，我们董理古代的知识，若说困难，比较更应该究心的，似乎还在经、史这两方面。

古人至少有一个时期是经、子不分的。其后特别尊崇了儒家的地位，于是经的位置，突然升高了，但是汉儒讲《春秋》，还有人把《公羊传》文当做经文应用。经过汉代今古文之争，三国魏时王肃攻讦郑学的纷争，魏晋玄学对儒家思想的冲击和南北朝南方和北方义疏的分歧，到了唐初孔颖达等人撰定的《五经正义》，汉代的经义已经有不少走了样或淹没不存了。何况后来还有宋、明理学的偏重义理，忽视前人的传、注，和元代以后科举考试规定专用宋儒的解说，加上明代成化末年（1487）以后八股文的格式逐渐成了制艺的定式，事实上就是读书人也不认真读经。倘若不是清代的汉学家们（他们在全国的读书人里实在是极少数）起了反动，重新开了三百年来研究音读、训诂、考据事实的风气，我们对古代的社会制度、人民生活所能够知道的地方更是寥寥无几，不知所措呢。历史是需要有连续性的。《五经》里面不但有历史，还有古人在他们的环境里所表现的思想，他们的生活背景，社会条件，和描叙纤微的活动记录。经书和先秦（甚至汉代）的子书联结在一起，就能够满足我们对古代许多方面的事物渴望知道的要求。我们的所谓读经，自然不是三十年代民国有些地方军人忽然心血来潮地提倡读经复古的那一套。但是，我们虽然反对复古性质的读经，肯用现代人的头脑和工具研求古代文明、思想和事物的人，却不能够自甘愚陋，在这一方面轻易放弃值得耕耘，并且日积月累，肯定地会有适当的收获的园地。我想这不止是在文字训诂、典章制度这些方面，就是文学理论、哲理思潮，又何独不然？近年我读到钱默存先生（钟书）的《管锥篇》，他看了《毛诗正义》里孔颖达释《关雎·序》的“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几句下面说的话：“设有言而非志，谓之矫情；情见于声，矫亦可识。若夫取彼素丝，织为绮縠，或色美而材薄，或文恶而质良，唯善贾者别之。取彼歌谣，播为音乐，或词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达乐者晓之，”以为这是精湛

之论，就“诗之‘言’可‘矫’而乐之‘声’难‘矫’”这一点在他的札记里说：

《正义》后半（按，即前引孔氏文）更耐玩索，于诗与乐之本质差殊，稍能开宗明义。意谓言词可以饰伪违心，而音声不容造作矫情，故言之诚伪，闻音可辨，知音乃所以知音。盖音声之作伪较言词为稍难，例如哀啼之视祭文、挽诗，其由衷立诚与否，差易辨识；孔氏所谓“情见于声，矫亦可识”也。《乐记》云：“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孟子·尽心》：“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吕氏春秋·音初》：“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谭峭《化书·德化》：“衣冠可诈，而形器不可诈，言语可文，而声音不可文。”皆以声音为出于人心之至真，入于人心之至深，直捷而不迂，亲切而无介，是以言虽被“心声”之目，而音不落言诠，更为由乎衷、发乎内、昭示本心之声，《乐纬动声仪》所谓：“从胸臆之中而彻太极”（《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五四）。（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62。）

钱先生博极中外，所以他的大作里又引古希腊人谈艺，说乐最能传真象实，径指心源，和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说音乐写心示志，透表入里，遗皮毛而得真质的话，来和孔氏的见解相印证。最后他说：“仅据《正义》此节，中国美学史即当留片席地与孔颖达。”钱先生不是泥古的人，《管锥编》里对前人的谬失处，纠正的地方很多，他更不会囿于汉、宋樊篱的成见。但是对古代的经籍，这一份分量颇不轻的文化遗产，我们如果认真地说要披沙淘金，要去芜存菁，似乎也该象他那样，先把它们的内容，丝忽无遗、锱铢必较地用上一番心血。

王静安先生（国维）在很多年前曾有《与友人论〈诗〉、〈书〉中的成语书》两封信（收《观堂集林》卷二），其第一封

信里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文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王先生这话是真确的，但是做为一位钻研古代文化传统的学者，王先生自己就是在这两封信里也未尝不举出几个例子，不但“强为之说”，甚且很确凿地指出前人传、笺之失，和后来的学者象清代的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瑞安孙氏（诒让）甚至他自己的一些发明之得了。比起全部经籍内容所包含的文化资料的丰富，纪录的详赡，王先生所说的这一类文字训诂方面的困难虽然很大，似乎还不致于完全阻挠学者们探索古籍的勇气，何况还有象张之洞《輶轩语》里说的“经语惟汉人能解，汉儒语惟国朝（按，指清朝）通儒能遍解。何也？国朝诸大儒读书多，记书真，校书细；好看古书不敢轻改古本，不肯轻驳古说；善思，善悟，善参校，善比较，善分别真伪”（《语学》第二）这些能够令人听了怦怦心动的話呢？我想，即使我们对一些经书有不少“不能解”的地方，其能解的材料也还是够人穷年累月研究的。

《诗》、《书》虽然王静安先生说过“最难读”，但是它们的体制、性质，我们是大体可以明了的，就是遇见象《大雅·板》里“民之方殿屎”这样的怪句子，看了《尔雅·释训》说殿屎是呻吟的拟声，或是孔颖达《正义》解说的话，也不会不明白诗里所描写的是那时候人民生活的疾苦，何况后世的成语在这方面还有“板荡”的说法呢？解释《春秋》的《公羊》或《谷梁》是比较沉闷枯燥的，幸而还有那本来未必是解释《春秋》的《左传》提供了不少的史实，其间即或有夸饰甚至虚浮的地方，研究儒家思想和“微言大义”的人，总算多了一部时代相近、材料丰富的参考资料。经书之中，我看我们现代人比较会感觉到艰繁的该是《仪礼》。正象《輶轩语》说它“句碎字实，难读，能解；

难记，易晓。注家最少，异说无多”那样，《仪礼》难读的缘故是因为它“字实”，每一件名物要是没有实物做参证，想象很不容易。虽然它一共十七篇只是张之洞说的“止十七件事”，但是每一篇行事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琐碎散浅，又正是我们“难记”的原因。从前人想解决这种困难，象张惠言的《仪礼图》，就想用大量的图说、图解，来减轻读书时的负担。虽然，那仍是不很理想的。在他的书里，有的图空空洞洞的，本来可以不绘；有行动的图，主人、宾、摈者、赞者挤成一大堆，虚线仍不足以说明他们行动的途径方向，再添上“《经》云”、“《疏》云“……的文字也堆在一块儿，有时候在图上还要驳一下敖继公（宋末元初时人，赵孟頫的老师）《仪礼集说》里的旧说，那图上的地位就真地不够施展的了。我想我们要想把《仪礼》读得好一点，除了要耐心细研前人的文字——象郑《注》、贾《疏》和正续《皇清经解》里收的一些著作——之外，最好能够集合一些考古发掘和考订的成果，尝试用现代的技术制出几套又有说明又能示范的录影片子来，那样我们对于古代士人这一个阶层的冠、婚、丧、士相见时行的礼俗，和士以上的其他贵族们一部分的礼制，一定会有更深刻逼真、更生动亲切的印象。（要是真地计画这样做，最先要考订的是古代的宫室房屋定制里的序、楹、楣、阿、箱、夹、牖、户、当荣、当碑……指的是在什么地方，才好决定陈设的地点，进展的位置。南宋和朱熹同时的李如圭著的《仪礼集释》、《仪礼释宫》，清代江永的《〈仪礼释宫〉增注》已经很讲究这些。）

我这里要说读经书的人应该注意《三礼》，这不是一句谬悠空谈的话，更不是要把学者们送到繁琐、支离破碎的考证牛角尖里去。历史是延续的，文化的增长进步也是沿袭重叠的，祖老太爷的面影不仅在子孙们的身上还依稀可辨，要知道自己今天许多行为和观念，恐怕也还不曾完全脱离两千多年前社会的信仰和习

俗。《礼记·檀弓上》说“君即位即为梓，岁一漆之，藏焉”（藏是在空棺里塞些东西）；三十年代的时候，曹禺先生的《北京人》剧本里写的曾老太爷，不是也每年要漆一道棺材的么？

我用《三礼》这个很旧的用语去包括叙述古代封建宗法社会的制度礼法最详细的三部古书——《仪礼》、《周礼》和《礼记》（后者我也想包括《大戴礼记》），也许是有许多人看不惯的，因为现代的学者们很多人相信《周礼》即或不是刘歆伪造的，也是古文家理想的行政制度的书，它的性质很象《唐六典》

（《四库》入史部职官类）、《大唐开元礼》（《四库》入史部政书类）这一类的书，和《仪礼》迥然不同。为什么到现在还要承袭这个错误的名词呢？这个批评当然有它的一部分理由。我的想法是：《周礼》的性质固然是偏向政书方面的多，但是古人用它的材料去解释《仪礼》、二戴《礼记》的地方很不少，而且也很恰当；它虽然只讲取官，但这些取官的职掌就往往和封建宗法社会的生活活动有关系；它虽然是依托理想，但是依托的东西里也有一部分恐怕用的是真实的背景、材料，实际上和《礼记》的说法也有相同的地方。《礼记》等书是儒家说礼经的大著作，但是礼经的素朴不完备的地方，汉儒们所说也难免有的地方真实，有的地方只是半真实半理想，或者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人合理的推测。这样说参看《周礼》仍是有用处的。例如《大戴礼记·朝事》篇里有典命、大行人、职方氏、射人、掌交这些人员的活动，我们是非参看《周礼》不能明白的；《投壶》篇里对那用做箭垛子的“侯”念的文辞恐怕也只有用《考工记》“梓人为侯”一节下面“祭侯之礼以酒、脯、醢，其辞曰”的话才能够校勘。

我们现在信口说封建制度，宗法社会，用的常常是现代头回过来看远古似乎有过那么一回事的语辞。若是有人质直地问我们，你说的封建宗法到底指的是怎样一回事？它们的具体事例是些什么？假如我们不读《礼记》、《仪礼》这些书，或者我们熟

悉的只是八世纪以前欧洲历史上所说的，也可以翻译做封建制度的feudalism（包括和它相关的manor采邑或seignioriness领地这些系统），或是十五、六世纪时日本史上所说的“大名”（daimyō），那么严格地讲，这些“萧条异代不同时”的外来的产物，虽然它们有些地方和中国古代的封建仿佛似之，在结构和形态上恐怕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研讨古籍，这里或者不需要去旁涉那些比较方面的问题，但是却不能不把中国古代封建的起原弄清楚。简单地说，西周以来的封建制度由君主把土地封给子弟，这些土地有些是刚才征服了的，甚至就是这些受封的人们去征服的，这些子弟分封下来的诸侯国家，和周天子之间保持的关系说得质直些只是一种在家族亲属范围里面的上下尊卑间的关系。

《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告诫他到曲阜去受封鲁国的儿子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说的就是这种封建的形势。后来把这种关系制度化了，“大人世及以为礼”，就成为繁密的，条理分明的所谓宗法。诸侯有国，国的意义应该包含他名义上管辖的疆土。但是他的实质上的另一个意义的国，也就是他自己在那里居住的城，就仅是一座环绕有城墙、四边有城门，包围着城有壕沟的较大的堡垒罢了。（《孟子·公孙丑下》：“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说的就是这种城池。《梁惠王下》：“国人皆曰可杀”的国人，就是住在这种城里的人。）在诸侯下面的卿、大夫，也有他们的城，那城的体制就成比例地比国君的规模小一点。（《公羊》定公十二年说“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史记·孔子世家》作“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超过了体制，就是逾礼了。这一座城，就是他们的家。在他们的家里，他们就是威权最高的君和父，所以《孟子·梁惠王上》一开头就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这种说法，到今天我们的语言里用的国家这一个复词上还看得见这一点递嬗的痕迹。

《礼记》里有几条线索是值得我们后世留心古典学问的读书人注意的：一是宗法社会的组织，国和家完全一样，有嫡、庶子的分别，嫡子里的长子就是君权的承继人（宗子），家产的领受和承袭者，他也享有其他的威望和地位。《内则》篇说：“適子、庶子只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入。子弟犹归器、衣服、裘、衾、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若富，则具一牲，献其贤者于宗子。夫妻皆齐而宗敬焉，终事，而后敢私祭”，也就足够说明这种情形的了。我们读《礼记》，要了解宗法的精义，还应该追求古人为什么要那样布置的原因。这在二戴《礼记》就有些文字可寻。这里姑且举一两个例：《礼记·郊特牲》说：“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敢有其室也”；原来国君到臣子的家里，臣子不教他走一般客人走的西阶上去，却让他走主人自己当走的东阶（叫做阼阶），这表示臣子所有的这个家，也是属于国君的，国君才是真正的主人。同一篇里又说：“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这里的家臣本来该向自己的家主磕头，才合规矩，但是家主上面还有国君，如果国君来了，最重的礼也不过是磕头，所以就规定家臣不向大夫磕头，好让国君承受这个最高的敬意。研究古代的礼法是要紧的，但是礼法背后字里行间的动机，自然是我们留心古籍更值得注意的地方。

宗法组织之外，另一点可注意的，是儒家对丧礼的特别重视。儒家特别重视丧礼，这一点虽然为墨子所反对，甚至也为道家的人所讥讽（如《庄子·外物》，笑儒生以诗礼发冢，盗取死者口中珠），但是拥护丧礼也就是丝毫不苟、条撕细理地去分辨宗法社会的上下尊卑，这正是君权时代要抓紧的最重要的一著。儒家的这一种记载和主张（《仪礼》里就有四篇，《礼记》里涉及的更多。）不但影响西汉以后每一个朝代的统治阶层，它在社会

和经济方面的波荡，更摇曳及于君主制度早已消灭了的今天。

探索古代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各方面的学者都注意的，它的一条研究的线索也在《三礼》，特别是《礼记》。这里所说的生活，从现代人的想法看来，主要的自然是希望多知道些一般平民的生活。《三礼》中的记载，却以贵族的为多，虽然它们也还有很清楚地及于庶人的一面的地方。（这一点《礼记》的《曲礼》、《王制》、《祭法》……都还有可看。）但是贵族里最低的一层士这个阶级，象《孟子》说的“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也常和庶人相混。战国时候各国尊贤养士，“蹶躅担簦”匹夫一朝而致卿相的很多。社会地位改了，贵族的生活习惯除了严格的礼制所拘束的事物之外，也有一部分是和士庶人相同的，那些委细的地方，如《礼记》所记载的，就很能够令人们发生浓郁的兴趣。象《少仪》说的“排闥说（脱）屣于户内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长在则否”，这虽然说的是脱麻履也要按着尊卑脱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入门之前得脱鞋这事实，也说明它的普遍性。

《曲礼上》说“户外有二屣，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这正象今人所说的尊重他人的privacy（这个字有时候英汉词典译做独处或隐居，尚非这里的意思）。又说：“凡与客人入者，每门让于客。客至于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请入为席”是进室里去摆好让客人坐的，可以移动的席子（《周礼·春官·司几筵》条《郑注》说“铺陈曰筵，藉之曰席”，筵是本来铺在地面做底层的，席盖在筵的上面。），这就教我们多知道一点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曲礼上》还说“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唯是比较更恭敬，更有礼貌的肯定语辞，诺是一般性的，象《论语》里子贡跟冉有的对话。这个简短的用语遗留到后世，象《水浒传》第二回王进入殿帅府参见高俅“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虽然情况不同，可能还是它的遗俗。诺字古音nak，

今天广州方言里有一个常说的答应辞，是顎化了的ngok，它的古音大概是ngak罢？

饮食当然是任何社会里生活重要的一环。单讲喝酒，《月令》篇仲冬之月教大酋监督酿酒那一段，就提出了六个酿造的标准，让我们知道古代制酒的精细过程。虽然它的文字和《吕氏春秋·仲冬纪》记的几乎全同，《淮南子·时则训》也仅少去几个字，可能根据的都是同一个来源，都是酿酒的重要史料。至于吃呢？我们所见到的关于肴饌应用材料的记载，在元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以前恐怕没有比《礼记·内则》所载更详尽的了。就是《齐民要术》本身，虽然文字有十卷之多，除了卷十所谓“五檠（馨）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那一部分或者有少数的东西是汉朝中国的北方没有或少见的之外，它是否真地比《内则》详细，也还待饮膳专家去细细研究才能徵实。《内则》有一节说：“炮，取豚若将，剗之剗之，实枣于其腹中，编萑以苴之，涂之以谨涂。炮之，涂皆干，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馑。为稻粉，糲洩之以为𩚑。以付豚。煎诸膏，膏必灭之。巨镬汤，以小鼎芗脯于其中，使其汤勿灭鼎，三日三夜毋绝火，而后调之以醢、醢。”这一段令人们看了食指大动的文字，恐怕就是后人作的食谱，也很少有把话说得这么精细的罢？假如我们在文字训诂上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孔颖达的《正义》这一段几乎是逐句译解的，这里除了一二处，我就可以不用多费笔墨。到今天还在世界各地尝得到的中国美味教化鸡的做法，不就很象是这一节文字前面几句的描写么？不过现代人用的是鸡，却不是猪、羊（原文第二句的“将”字当作𦍋，就是公羊）罢了。原文的下半所说的炮炙以后再进一步的烹调，恐怕后世还没有很多人做过尝试的实验罢？孔《疏》里所缺而未讲的地方，在《内则》别处，还可以觅到相关的文字。在“为稻粉，糲洩之以为𩚑”这句，就可以参考下面另一段“取稻米举糲洩之，小切狼臠膏，与稻米为𩚑”

的注疏。膏就是煎熬出来的脂肪（现代广东方言里猪油还叫做猪膏），狼臄膏据郑玄《注》是“臄中膏”，指的是牛、羊、猪胸肉部分煎出来的油。飣字，据《周礼·天官冢宰下·醯人》“羞豆之实，飣食、糝食”句郑玄《注》引《内则》这同样的一段，或当作糝。用现代的语调，这里说的只是舂米成粉，加上牛羊等脂膏，合粉在一块儿煮得象粥那样糊糊的，稀的叫做飣，厚的叫做糝罢了。这个较容易明白的解释，见段玉裁《说文解字》卷十四下飣字注。

《礼记》本来是杂记的体裁，它记大的事件，也记小的事情。大事象妇人的“三从”之义，最早在《仪礼·丧服》的《传》里解释已出嫁的女子为什么仅为父丧戴孝一年这件事的时候已经加以说明，在《礼记·郊特牲》、《大戴礼记·本命》篇里，又分别地强调了它的严重性。“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内则》），这种习俗，不止保存了许多代，也流及东方崇奉儒教文化的其他国家。纤细的描写，象《内则》说男子身上的佩物，“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捍、玦、管、遘、大觿、木燧”（《内则》），孔《疏》还引皇侃说“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以右厢用力为便，故佩大物”，这情形看来其实很象现在西方有些国家肉铺里伙计身边佩的钻子、凿子这些应用的工具，和《红楼梦》里所看见的荷包、扇囊之类，还有性质的不同。中国在佛教东来以前没有信仰性质的宗教，但是热烈的祖宗崇拜实际上也象是宗教。《诗经·大雅·文王》说：“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祖先既然经常在上帝身边，还要别的宗教做什么呢？宗教虽然没有，但是鬼神却依然存在。古人祭祀的时候必定教小孩子扮做祖先的尸，这是在《礼记》和其他的经籍里都常常提到的。照《礼器》篇说，夏代的时候尸是站着受拜的，殷、周的尸都是坐着。这说的还是一家、一庙的祭祀。（士、庶人没有庙，仅“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见《祭法》。）

要是周代的大贵族在太祖后稷的庙里举行禘祭的话，其他六庙之主都来合食，那么除了后稷的尸之外，还有其他的六尸，也请来聚在一块儿；由祝官劝酒，那情形就很象川剧《哭祖庙》北地王刘谡在刘备的庙里哭诉祖宗，死了的诸葛、关、张、赵、马、黄也一齐出现的样子了。四十多年前我看见江、浙人家里祭祖，也有用一张八仙桌子，四边摆好八个座位，安置杯、筷，“祭神如神在”的；这里虽然没有尸，也很近古朴的风俗了。古人有丧事哀痛哭泣的时候，还也一种顿足的规定，叫做踊。踊也要看亲属关系的厚薄，所以《杂记下》就有“踊绝于地”，“踊不绝地”的区别。

《檀弓上》记子思哭嫂嫂，“妇人倡踊”，就是先由子思的妻带头跳踊。这种习惯，和许多其他繁复的礼仪，正是儒教用礼教去节制情感的特色。我们要是不看《三礼》，对我们所关心的宗法社会和跟它连在一起的封建制度，就很难知道这些底蕴。

史学方面的书，或俭或丰，不论汲取多少，当然是一般人的常识的一部分。但是就是做专门研究，通史长编性质的书象《资治通鉴》，也可以做很好的基础，虽然它关心的“历代君臣事迹”，还以政治、经济、盛衰兴亡方面的记载为多。因为它是编年体裁，要寻索一件事情的始末，至少要检求好几年的文字，所以又有《纪事本末》这一个系统体裁的书，可以减少阅读之烦。不过《纪事本末》区别门目、分类排纂的当然都是历史上的大事件，象三家分晋、后周世宗征淮南这些大关目，对于一般琐细的无所隶属的小事情，或是偶发事件，自然不会述及。可是这些小事情，有的时候也是读史的人要关心的。例如《通鉴》卷二〇五说：“太后（按，武则天）习猫，使与鸚鵡共处。出示百官，使观未遍，猫饥，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惭。”（则天后长寿元年，692）女主驯养猫，那里算得是历史事件？但是我们要是一检敦煌残本《（大云经）神皇受记义疏》（S6502，参看S2658）里面引的，为则天称帝做预伏张本的《广武铭》所说“离猫为你守四

方”的话，加上象《隋书》卷七十九《外戚·独孤陀传》所叙述的北方民族事猫鬼的信仰，那么我们对太后习猫这一件事情，就不能平淡视之了。这样说来，即使《资治通鉴》有二百九十四卷之多，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那么悠长的史迹，我们还是应该把它读全的。从前人读《通鉴》，还要自己圈点，现在新的标点本出来了，如果我们每天只读它一卷，也不需要一年的时间。

《通鉴》加上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书目答问》的夹注说“宋、元、明人《续通鉴》甚多，有此皆可废”），编年体的书籍算是有了著落了，但是传统所说的所谓正史，我们还不曾有机会把它摩娑。唐代以前的人习惯爱读三史，通常是指的《史记》、《汉书》和后世已经残阙不完的《东观汉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二《三史》条以为《史》、《汉》外指的不是《东观汉记》，是谢承或华峤的《后汉书》。无论如何，唐朝人所说的三史，就的确是《史》、《汉》和范曄的《后汉书》了。后来的人又加了《三国志》，凑成了四史。普通的意见象《辘轳语》说“正史中宜先读四史：全部浩繁，从何说起？四史为最要。”它又说：“四者之中，《史记》、《前汉》为尤要。其要如何？语其高，则证经义（原注“多古典、古言、古字”。），通史法（原注“诸史义例，皆本马、班。”），语其卑，则古来词章，无论骈、散，凡雅辞丽藻，大半皆出其中。”

（《语学》）我想这话虽然是一百多年前的人说的，却不能说不是经验。文学和史学的界限我们固然可以分辨得很清楚，但是史书里面有文辞魅美的篇什，也当为读书的人所不弃。我们现在缩小范围，单从普通做学问的观点来看，那么全部的史书，正象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尊、鼎、彝器一样，都可以说是人们研究的素材了。古器中有铭文款识的，考古和历史学者们无不悉心研究，并且要从研究的过程中考定出一些通例来，象国名、纪年、古人命名的办法、征伐的记录，都是治古史的人啧啧称道的。但是古器

物上面的文字是有限的，研究的人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还要尽可能地利用旁的古籍里记载的纸面材料，不用多说。《史记》、《汉书》这两部书，一部是中国最早最象样的通史加上作者记录西汉同时代的一部分的人的业绩，一部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这已经是很可以宝贵的了。更可傲视的是，它们两者在史迹上相承交替，篇幅都很大，有足够的容量和条件能够充分地用史家亲切畅快的文字向后世说明它们的体例和所以那样规画的原因。在它们以后其他朝代的正史，能够在前人已具的规模上稍加整理的自然还有：象《新唐书》开始才有《兵志》和《选举志》，前者是因为西魏、北周虽有府兵的雏形，到隋、唐这个制度才建立完备；后者也是因为科举取士，到唐代办法才比较复杂起来，需要多些地方说明。又象《宋史》有《蛮夷传》，指的实在是后人说的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明史》改称《土司传》，又分刊湖广、四川、广西、云、贵，这都说明后来政策和制度的改变，也符合实际的需要。其他各史中，立有标新立异的名目，只在一个时期出现的，这里就不絮述了。重要的是，这《史》、《汉》两书的体制，几乎可以说是后世所有的正史在撰写时都把它视做楷模的经典，就是在平素闲豫的时候不曾浏览其他正史文字的人，只要是有了详细地看过《史》、《汉》或者如前人说的四史的经验，再看自己需要读的别的史籍，那不仅会左右逢源，简直是事半功倍。记述典章制度方面的通史，杜佑《通典》所占的地位也跟《史》、《汉》同样的重要。《通典》的叙述，由上古仅到八世纪中叶的唐代天宝，内容和正史的各篇志书方面当然会有重累烦赘的地方。但是《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南、北史》都没有《志》，《通典》博采经、史和汉、魏、六朝人的文集、奏疏跟历代沿革有关系的文字，辑成这部二百卷的大书，却不容易。杜佑是个有行政经验又留心时务的人，他在贞元十七年（801）淮南节度使任

上编成《通典》，已经是六十六、七岁了，上书给德宗说他搜集材料，“自顷纘修，年逾三纪。……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乘疏”（《旧唐书·本传》），说的是很老实的话。后世的《通志·二十略》、《文献通考》都是用它做蓝本的作品，也都不能免于有直接采用《通典》原文的地方。

我前面几段杂引的一些经、史方面的书，除了四史中的《三国志》之外，篇幅都较大，而且私心还希望有志读书的人读它们时就是整本地读，有注、疏的就要连注、疏看，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中国旧剧武旦演员的蹀躞，芭蕾舞的dance on point，杂技团触目惊心的表演，医院里医生的操刀割症，实验室内的试验发明，世界上有那一个行业不是日积月累，心力和物力的结晶呢？中国传统的学者教人读书先提议读七八种基本书籍的要求，这恐怕正象是齐白石早年用过功的花鸟草虫罢？这种精选少数的专书给人的作法，是比二十年代请些学者们开国学入门书要目一下子就发出一百五六十种书名的书单要冒多少风险的。因为开书单开的书名愈多，开单的人责任就愈轻愈小，最后把这些书全弄来放在书架上，“邨侯家多书，……新若手未触”，也就够象开个小图书馆的了。十多年前我的朋友傅德山先生（Prof. J. D. Frodsham）告诉我一段他初进剑桥大学时的故事。那时他有意学汉文，做中国学问。他的老教授把他带到剑桥著名的藏中文书的图书馆里，四面张一张，然后两手一挥，就说：“中文书都在这里了！你好自为之，四年后再来见我就是。”我不知道傅德山先生这些话有没有一点《文心雕龙》说的夸饰的成分，但是听他讲的人却不免受到了一点鞭策，顺便也引起了一点无名的警惕。我上面写的文字，真地能够提供什么万宝灵丹的书给读者么？既然侈谈读古籍的门径，尽力而为，也不免四面张望一下，这就想起借重民国初年黄季刚先生（侃）在北京教书时要学者们精读《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

《史》、《汉》和《文选》这八部书的旧话了。我没有见过季刚先生，却认识一两位他的弟子，看来这个传说大约是靠得住的。这八部里面没有季刚先生也喜欢讲的《文心雕龙》，这且不提，有《周礼》、《毛诗》、《左传》，也可以说正是传古文经学家法的本色。但是《三礼》中很重要的《仪礼》，怎么会不提呢？适才偶检《黄季刚先生手写日记》（台北，学生书局，1977年），看到里面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十月廿六日至十一月廿六日的《散叶日记》，知道先生几乎每夜必定看若干叶的《仪礼·疏》和《汉书》的列传。《仪礼》他用的是清代胡培翬的《仪礼正义》。这书胡培翬并不曾撰完就患病死了，所以其中有五篇是培翬的学生杨大靖和族侄胡肇昕补撰的，《日记》中称“杨补”的就是。这样看来，八部书之说就是在《日记》主人的晚年，自课的时候对这也是很认真的。不管这些吃紧的书到底是那几部，我们有了现实的榜样，对于传统的学者读书的态度，也可以多一点了解了罢？

精读一部分的古籍，简括到只剩下对各个人或者有益的不同的几种，这无疑地仅可以说是扎根结实的的一种训练。困难是难免的，但是经过了盘根错节，对文字的理解和事物的观察就比较多一点把握。然而这还不能处理特定的问题。任何一个特定的问题研究的对象都有它的小范围和大范围。小范围自然集中在和那问题本身直接有关的时、地、人、事各方面的情态，但是小范围内直接的问题也有时候不是单从排比一下它本身已经具有的材料就一定可以解决的，否则这问题也就不成为什么问题了，那么进一步就得从大范围落墨。譬如说：我们要研究明代文人吴承恩的事迹，首先读的直接的、小范围内的材料自然是他本人的著作，象《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万历己丑，1589年刻本现藏台湾；这书还有1930年故宫博物院的排印本），和刘修业女士用它辑校的《吴承恩诗文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85），和《淮安府志》、《山阳县志》……内和他有关的那些资料。从这些文字

里，我们当然可以粗略地模画出一个吴承恩的生平的轮廓，但是一定还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一点，却不够详细，还有许多曲折，斗不上筭。那么，我们势必更要顺着可能的引导线索，去追寻其他的材料，象和他有来往的人的著作，如何良俊的《何翰林集》、《四友斋丛说》，何良傅的《何礼部集》，朱曰藩的《山带阁集》、《池上编》，文嘉的《和州诗集》（收在《文氏五家集》里），归有光的《震川先生集》，李春芳的《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徐中行的《天目先生集》、《青萝馆诗》，黄姬水的《白下集》，陈文烛的《二酉园诗集》，王宠的《雅宜山人集》，皇甫汈的《皇甫司勋集》，万表的《玩鹿亭稿》，蔡昂的《鹤江先生颐贞堂稿》，陈耀文的《花草粹编》这些，我们就不能不一一觅求，加以细研了。阅读这许多书大概可以说是就这一个课题而言的大范围。范围虽大，包围虽广，但是后来到了两三个要解决的特别的问题上面，这样做法的效能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例如我们知道吴承恩在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七年（1554—58）间曾在南京住过，在那里他参加过不少次诗酒之会，也曾做过当地阀阅贵胄东园公（徐天赐）府第里的宾客，同时这时候又正是东南一带倭寇在舟山群岛做根据地，大肆猖狂，烧杀劫掠，沿海沿江许多城镇都受到他们的骚扰的时期。我们要详细理解这个时候复杂的时代背景、地方环境，吴承恩交往的人们特点和癖好，和他个人的遭际、心情，这些诗文集和记录里就有不少地方可以供我们取资。我们如果有根据地运用了这些素材，写出来的吴承恩事迹就不会象流水帐似的那么枯燥，也不会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而不能成篇。更进一层说，阅读的网面愈扩大，能够汲取的知识愈丰富，它给我们带来的无形的利息也就愈多。从刘修业女士撰的《吴承恩年谱》（收《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亦见《吴承恩诗文集·附录》）里我就可以举一个很好的例证。刘女士曾根据

吴承恩撰的《寿叶太老夫人八十颂》和另一篇纪念这同一个人的《叶太母挽诗序》两篇文字，知道这位叶太母娘家姓孔，是“圣人之裔”；她又是一位淮安叶姓尚书的夫人；她从丈夫死后到嘉靖三十三年（1554）曾经守寡了五十多年；吴承恩娶的，就是她的曾孙女。刘女士考证淮安叶氏在和这些话有关的时期只有一个叶淇（1426—1501），弘治初年做过户部尚书，到弘治十四年他就死了。从叶淇死时算到嘉靖三十三年一共五十三年，这也很符合这位叶太母寡居五十多年的数目。所以她猜想这位问题中的人物是叶淇的夫人，可是没有旁证。后来王有三先生（重民）在李东阳的《怀麓堂文后稿》卷二十四发现了叶淇的墓志铭，原文说：“公配何氏，赠夫人；继阙里孔氏，封夫人，皆有内行，”这位叶淇的继配就是这一位本身姓孔，“先师四十五代之真裔”的叶太母无疑了。这是一段很精细的考证，若是没有看过《怀麓堂稿》，就不会觅到这个最后决定性的证据。（《怀麓堂稿》共一百卷，《文后稿》三十卷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学者们做学问注重杂览，象这里所举的那杂涉的园地又比我上文说的研究问题的大范围不知道要阔到那里去了！真地，清末的王闿运大家知道他是今文经学和汉魏六朝诗文的名家，和咸、同到晚清的政治也很有关系，可是谁又预料得到他的《湘绮楼日记》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年初寂静，别有情味，诗家所未言”几句下面会有三百多字的夹行注，提到《封神演义》的撰写时代居然说：“其文有狼筓，在明嘉靖以后”的呢？

我在前文曾经提到中国传统的著作综合性占优势，和古代书籍的体制不无关系。但是我们传统的做学问的方法也从能够博览入手，这也许跟我们悠长的历史、汗牛充栋的著作把许多类似或看似相关的事物、观念很容易地都打成一片，也不无关系罢？和我们的这一个特点（如上文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优点）恰恰相反的，是西方人头脑的分析性。我想，这也是我们做学问的人

有机会的时候应该多向他们学习的。学问广博，知识能够把握了事物的全面，是可以矜贵的。但是只知道综合归纳而不细心分析，模糊、笼统的弊病就会发生。汉语的文法本来不似若干其他的语言那么呆滞和谨严，文学的浑成圆熟之美的了解要靠长期的讽诵和习惯。汉代人念古书，句、读是要靠老师传授的，这习惯一直到后世的私塾里，村学究每天用朱笔替学生“上书”，也还是一样。《宋史·儒林传八·何基传》说何基“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这是南宋末年少数学者读书时自加句读的一个证据，但是这也可以见读书断句之难。何北山是理学家，朱熹女婿黄榦的弟子。他自己的弟子王柏向他“质问难疑，或一事至十往返”，所疑的不一定全是讲句读的事，但句读的质疑，恐怕也会在内。其实，《论语》里面模糊的句子，象“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止是标点句读的问题，“与”字在这里的词性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说。句读之外，古书里省略或缺漏的文字不少，即使是正式的史传，也不例外，这一点读书泛滥的人因为见的多了，也就不以为怪，但是对后世要求清楚、认真的人，就会是很大的不方便。恰巧我们谈到何基，就用《何基传》举个例罢，《本传》云：

……景定五年（一二六四）诏举贤，特荐基与建人徐几同被命，添差婺州学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力辞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馆校勘兼崇政殿说书，屡辞，改承务郎，主管西岳庙，终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宋史》卷四三八）

南宋度宗在位的时间很短，咸淳一共才十年（1265—74）。但是何基死在那一年，传里却没有说，我们虽然知道他“卒年八十一”，仍是不知道从何算起的。幸而王柏的《朋友服议》里提到“咸淳戊辰（按，四年，1268）腊月十有九夜，承北山何先生之讣”（引见《宋元学案》卷八十二），才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疑

问。又如《元史·张桓传》全篇只有一百几十个字，说他“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跟着就是一句“未几，汝宁盗起”。他做官在什么时间，前文固然没有说，汝宁发生的事是什么，更令读者莫名其妙。要想把这一句话弄清楚，我们得看《元史·顺帝本纪二》，才找得到〔后〕至元三年（1337）二月，“棒胡反于汝宁信阳川”的史实。古籍里的记载，正史之外，不论是诗文集、碑传、行状、家传，这些只顾文章雅驯，不管读书的人死活的地方，是举不胜举的。它的弊端恐怕也是因为我们多数人的头脑一向综合性长，分析性短，读书即或不是不求甚解，也往往只是但观大意。这种但观大意、不耐烦琐的习惯，恐怕是我们研究学问很严重的一种缺失。

许多人说西方人的分析习惯，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刀放在一边，叉放在另一边；喝不同的酒时用不同形状的杯子；切肉的刀不能切鱼这些事上也可以见之。这也许只能说是茶余酒后的谈助罢？但是，思考的重逻辑，解释问题的重析辨，把问题切得细细碎碎地观察得一丝不苟，这是西方科学方法应用到人文学术的萌芽。我们的传统学者研究的时候当然也有分析，不然，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里“之”、“脂”、“支”的古音不会分在三部，钱大昕也不会举出几十个古无轻唇音（labio—dental）的例证了。就是普通的议论，也何尝没有鞭辟入理的文字？只是韩昌黎说的气盛言宜的念头似乎应该谨慎，至于明、清四百多年间八股式的文章，虽然它反正开合、起伏顿挫，有人以为也有逻辑性，但是，用八股的程式去做学问，那恐怕是去道很远的了。我想我们考究问题，西方十九世纪以还直到现代不少学者的著作，在分析严谨如剥茧抽丝这方面，是大可以供借镜的。虽然《礼记·曲礼上》也记载过“左馭右馘，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孔老先生也讲究“割不正不食”，我们手边用的一把解剖刀，还得学学《三国志演义》第三回袁绍向董卓说的“汝剑利，吾剑未尝不

利”那样勤加操练，才能够综合之中有分析，分析之后再综合，达到了现代人希望的做中国学问的一个境地呢？

以上凌乱写的这些杂感，不用说是眼高手低，虽然态度是很诚恳的。假如年青的中国学者们看了它，知道一点西方人思考的长处，或是西方人治中国学问有志趣深入的，从而见得一些做中国传统学问的门道，那么东方西方的交往，也许会多了一点认识罢。如果这样的理解是共通的，这里收入的几十篇文字，虽然是“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也许还有热心的良医空暇的时候会把它拿来反复审查一下的。

编者注：本文系作者论文集《和风堂文集》的序文。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教授。

